

从战士的气质和情感出发

——访舞蹈艺术家仇非

■本报记者 袁丽萍



仇非，舞蹈艺术家、国家一级演员、编导，1949年1月出生，1959年12月入伍，曾任原空政文工团团长。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《中国革命之歌》的演出，代表作有舞蹈《送别》《起飞线上》、舞剧《伤逝》等。他是舞剧《红梅赞》的艺术总监、第五次复排歌剧《江姐》的导演，曾担任《强军战歌》演唱会、“和平号角—2014”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届军乐节导演。他导演的民族歌舞晚会《当兵走边关》《情暖边关》《筑梦边关》获第三、四、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会演大奖。2009年，他被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中国舞蹈艺术“突出贡献舞蹈家”称号。

记者：您15岁时参加了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的演出，能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

仇非：1959年，我被招入原空政歌舞团学员班。当学员时，我们参加了很多活动，一次非常珍贵的经历就是1964年参加了《东方红》的演出。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。我参加了“秋收暴动”“遵义会议”“陕北会师”“渡江”等段落的演出。演出时，上个段落一结束，就得赶紧跑到后台换下一段落的服装。后台在夹层，场地小，演员多，全是长条板凳。我们3个人分1条长凳，换完服装叠好，然后安静坐在凳子上等着。一旦接到候场通知，我们立刻排成一队，左手拿道具，右手扶着楼梯扶手到大会堂西门厅准备上场。在排演《东方红》的日子里，我们这些学员跟前辈学到了很多好的艺术作风，加强了我们的集体观念，并熟悉了解了舞台。

记者：1970年前后，您从一名演员逐渐参与到舞蹈创作中来，《起飞线上》是您参与创作的第一个舞蹈，您也是该舞的领舞。这个舞蹈当时在部队演出时非常受欢迎。创作过程是怎样的？

仇非：一开始我也没想搞创作。作为演员，我经常给编导提意见。有人就说，那你来编。当时很年轻，也不怕，心想编就编。我们几个演员就一起想方案，总想着这个舞蹈还可以怎么体现。后来，我调进了创作组。《起飞线上》的创作是在程心天老师的帮助下进行的，是反映飞行员军事训练的舞蹈。我们多次去部队，一待就是1个月，认识了很多飞行员，了解了飞机从起飞到着陆的全过程。有一次，我们甚至还看到飞行员进行一级战备演练的场面。这个舞蹈是有生活基础的，所以演出才能成功。创作得有源头，你想用舞蹈表现军人，就要了解军人的情怀、军人的气质。好的舞蹈是对军人本身形体和气质的一种情感的放大，它一定是有兵情兵味的。

记者：您组织创作过《蓝天长城》《精神文明赞》《绿色年华》《走在春风里》《飞向新世纪》等多台晚会，反响都很好。比如晚会《蓝天长城》，既是反映时代发展的主题，又充满浓郁的空军特色，受到军内外观众的认可。您认为好的节目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创作好一台晚会要考虑哪些因素？

仇非：还是那句话，好的节目就是要接地气，要有兵情兵味的。编导不能把自己的感觉当成是战士的，不能是自己臆造的或是想出来的，而要从生活中提炼、从生活中提高。就《蓝天长城》晚会来说，一开幕就是一片云海，一下



舞蹈《飞夺泸定桥》。二排右一为仇非，摄于1978年10月。

仇非提供



仇非在接受采访。

王晨光摄

将观众带入空军的第一视角。突然，云海消散，在威武雄壮的音乐声中，舞台上出现40个飞行员，叠加女高音演唱：“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空。”这是阎肃老师写的词。这完美地展现了空军守卫蓝天的豪迈气概。在舞蹈设计上，我们借鉴了杂技的倒板技术，演员可以倒成斜45度，模拟飞行的样子，体现出空军的属性特色，当时观众的掌声“哗”地就响起来了。所以，想创作一台好的晚会，就要寻求一种新的表现方式，同时还要用准确的舞蹈语汇去体现、准确的舞美手段加以烘托。在这台晚会上，我们在国内率先使用了电脑黄金灯，舞台灯光的照度及色彩千变万化，焕然一新。当时，舞美灯光协会的专家还专门观看了晚会并召开座谈会。搞好一台晚会，需要“风正、气顺、人和、艺精”的内部环境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们以业务建设为中心，以创作龙头，带动文工团的全面建设。我们每年都组织一次集体到部队采风，并组织一次笔会。阎肃、羊鸣、张士燮3位老艺术家都60多岁了，仍坚持每年都创作组其他同志一起下部队体验生活。

记者：到部队采风的收获有哪些？

仇非：我们到部队采风不仅仅是参观座谈，阎肃、羊鸣、张士燮等老同志还会给官兵普及音乐知识、写诗歌，教唱他们为部队创作的师歌国歌，还有创作者教战士吹奏乐器、识谱。我们有很多作品都是从部队采风得到的灵感，比如歌曲《说句心里话》《父老乡亲》《一二三四歌》《天职》、舞剧《情归》《云上的日子》等。对我来说，印象深刻的就是舞蹈《云上的日子》的创作。舞剧《红梅赞》的导演杨威，刚调到空军不久，就想创作一个关于伞兵训练的舞蹈。因为我

到过伞兵部队多次，参加过伞兵跳伞训练的全过程，就向杨威介绍伞兵的工作、训练和生活情况，比如伞兵如何上飞机、怎么出机舱、如何叠伞等细节。基层采风带回来的内容是鲜活的，而越鲜活、越接地气就越能产生鲜明的舞蹈形象。舞蹈《云上的日子》抓住新兵第一次跳伞在机舱内复杂的内心活动，以及最终战胜心理障碍、成功完成训练任务的过程，为表现军兵种特点、挖掘人物内心进行了成功的探索。

记者：舞剧《红梅赞》获得国家文华大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5项大奖。您作为这部剧的艺术总监和艺术统筹，能否介绍一下创作历程？

仇非：我记得，那是在距离建党80周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节点上，在创作会议上，大家提出，我们应该沉下心来搞一台能够留得住的剧目，为建党80周年献礼。创作组组长张士燮的建议是搞一部舞剧，阎肃、羊鸣也希望创作一部有影响的作品，但肯定不能是歌剧《江姐》的翻版。编创舞剧《红梅赞》的方案得到领导和机关的认可，并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支持和保证。当时我带着创作组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，积累创作素材。经过反复试排、推翻重来、舞台合成，2001年7月，舞剧《红梅赞》在保利大剧院亮相，很多舞蹈界的专家都前来观看，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，得到观众的认可。

记者：第五次复排的《江姐》在国家大剧院排演过程中，压缩了半个小时的篇幅。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调整？

仇非：2007年，国家大剧院刚施工完，需进行试运行，就邀请原空政文工团在大剧院戏剧厅演出第五次复排的

获奖。随后举行的“红叶诗会”上，获奖代表、诗友代表朗诵本届获奖的优秀作品和《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》等诗词。

兵乐队唱响兵故事

■曹兆雷

“军营就是历练场，梦想更有分量……”老兵退伍前夕，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5名战士自发组建的“车轱辘”乐队，在该旅各营区巡回演出。动感新潮

的音乐旋律，朗朗上口的歌曲内容，激情澎湃的摇滚节奏……一首首取材于官兵身边人、身边事的军营原创流行音乐，为官兵带来阵阵欢笑，受到官兵欢迎。

该乐队组建于今年春节前夕，乐队成员均来自基层一线。枪炮轰鸣的训练场，清脆嘹亮的军号声，震耳欲聋的呼号声……火热的军营生活给他们的音乐梦想注入丰富的创作灵感。他们用军旅歌曲讲述迷彩故事，以摇滚音乐的形式展现基层官兵生活，先后创作了《铁拳出击》《长安路》等十首歌曲，不少已经成为该旅官兵传唱的热门歌曲。

“难忘的军旅生活，让我们以文艺的方式‘另存为’。我们将继续唱响兵故事。”乐队成员高佳琪说。

《江姐》。戏剧厅的舞台台宽18米、可用进深40米、高度13米，透视图很好，有多种推拉升降设备。《江姐》的复排必须根据这个舞台提供的现代化设备设施、多层次的表演空间进行编排，对场景灯光及演员的表演上都进行了调整。另外，我们根据观众的审美及习惯，要把原本3个小时的演出时长进行压缩。我们一段一段地看、一段一段地删，仔细研究哪个词不说、哪个唱段不要。最后，砍掉2430多个字、取消中场休息，演出时长压缩到2小时18分钟，保证了演出的成功，在国家大剧院现代化舞台上展现了歌剧《江姐》永恒的生命力。这得益于我们老艺术家在艺术上宽广的胸怀、不断创新的精神，及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。

记者：您曾多次到部队慰问演出，对现在文艺轻骑队的演出和创作有什么建议？如何创作出官兵喜欢的军旅舞蹈？

仇非：我们那时候一下部队演出就是两三个月，乘坐的是卡车，自己背着背包，演出器材都放在车上。一到部队就卸车装车、整理场地，有时在地面铺上卡车篷布就开始演出了。部队官兵看到有这样一支文艺轻骑队来演出，很高兴。当时文工团对演员的要求是“一专三会八能”，我们不光会跳舞，还要学曲艺、器乐、小品等，所有演员都要参加装台卸台、打灯光、卷幕布等工作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野战文艺为什么那么受欢迎？是因为我们下部队演出绝对不给部队添麻烦，不影响部队的战备训练。另外，我们还根据部队的具体情况深入基层，为官兵服务。

任何创作都要从生活中来，再到生活中去。舞蹈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，更需要有扎实的生活素材加以提炼，并吸收其它艺术元素，才能形成舞蹈创作的出新。军旅舞蹈，要表现人，要表现现代军人，就要去挖掘军人的情感、扎根部队深入基层，要从战士的气质和情感出发，不断用丰富的舞蹈语汇、充满时代感的舞蹈语言，讲好现代军人的故事。

(夏董财、王 轶整理)

采访手记

那些“没想到”

■袁丽萍

采访出发时，我的心里略有忐忑——

当团长、当导演，仇非对作品把关严格、对团员业务能力要求高，在业界是出了名的。这样的艺术家，会不会难以接近？

更何况，他是习惯于用形体表达情感、塑造形象的舞蹈家，会不会跟我们聊一会儿就冷场？

让人没想到，他竟如此健谈、可爱。一聊两个多小时，他用京腔京韵讲起那些故事，伊如评书，生动极了。他活灵活现地描述当年参演《东方红》的情景，那份小学员一板一眼的认真和跟着老艺术家学习的激动，让人感同身受。讲到《飞夺泸定桥》，他兴之所至，手舞足蹈，索性站起身亮开了个相，身姿挺拔，仿佛就是当年那个勇敢坚毅的“红军指挥员”。

在仇非这儿，“让人没想到”可能是个高频词：打造特色晚会、将杂技技巧引入舞蹈、大胆采用新式舞台灯……

人们常说，创新思维，是艺术发展的动力和艺术家的生命力所在。仇非的作品和经历，便是对这句话的生动阐释。

书香飘军营

■张柏华

武警北京总队某部以“朗读者”形式开展读书交流活动，调动官兵读书学习的积极性，丰富军营文化生活。活动中，该部官兵踊跃登台，分享阅读《北上》《苦难辉煌》等书籍的感受体会，传递从中获取的力量。据了解，该部还将依托营区设置的自助图书柜，广泛开展“我是演说家”“士兵讲堂”等群众性学习活动，鼓励官兵多读书、读好书。

山河记忆

从磨盆山下的葛溪，溯流而上，山峰如玳瑁，野树如帘幕，有不规则的椭圆形盆地豁然跳到眼前，集市如流，沃野十里。这就是葛源盆地，江西省横峰县北部的粮仓和“油库”。

在公路还没畅通的年代，这里或许还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。每次去葛源镇，到了五里铺，我都有这样的念头：生活在这里多好。葛溪绕村前一抹背影远去，野生的洋槐和枫香树沿溪边簇拥，村后是笋一样挺拔的山，竹林和树林把整个村子捂了起来。

“中共赣东北（闽浙赣）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军区”革命旧址所在的枫林村旧民居，把葛源盆地人往日的生息景象，以泥土、砖瓦、木料的方式，封存于历史记忆里。村里的小巷四通八达，用河堤捞上来的卵石，夯实在黄土里，铺成巷道，独轮车、草鞋、板车的碾压和雨雪的浇筑，把卵石基本磨平，在春日雨滴的油润之下，闪闪发亮。苔藓在石缝里，作为岁月的印记，兀自油绿。小巷把村子变成了迷宫，七弯八拐，我们瞬间消失在玄阵般的迷雾里。

“省军区指挥部”旧址是一座大院。说是大院，其实也就是前、中院子的房子。从门楼进去，是一个院子；再进去是一个大门，两边是厢房；继续进去，是院子，以天井为格局，四方形；最后进去的屋舍算是正房，敞开式的厅堂，各式房间对称地依序布置。葛源盆地的普通民居以黄泥、石头、木料为基本元素，冬暖夏凉。离开村子外出谋生的人，会怀念门口的枣树，怀念清凉的草席，怀念木桌上的油灯，怀念谷雨之后再次回到房梁上筑巢育雏的雨燕，怀念小巷里清晨“踏踏”的脚步声。他们的故人，他们的亲人，在矮小的房子里喝茶、打瞌睡，在油灯下编草鞋、穿梭织布。葛溪边的水碓房里，水车在日夜地咿呀呀。

葛源盆地四面高山，是德兴、上饶、弋阳与横峰相交的地方。我每次进入葛源，都会想起一张照片：英俊刚毅的面容，略显瘦削，浓眉大眼，鼻梁挺拔，耳廓肥大，眼神坚定，头发像山冈上的丛林，穿一件旧棉大衣（在我看来，更像一件被风吹起来的战袍），脚上戴着镣铐，魁梧的身材和他所在的根据地灵山相似。这是我于1997年，在南昌梅岭看到的照片，至今忘不了。照片中的人，即先烈方志敏。我不掩饰对他的敬爱。作为男人，他俊朗，脸上终日映着阳光，做事果敢，有担当；作为军人，他有谋略，有血性，威武不屈，有号召力；作为作家，他的《清贫》《可爱的中国》响彻历史的天空；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他践行了“努力到死，奋斗到死”的誓言，生命的航向始终没有改变；作为世代务农家庭的儿子，他有胸怀天下之志，有兴邦治国之才。他的文章，我们耳熟能详；他的事迹，我们世代口口相传。

方志敏于1899年8月21日，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。他8岁入私塾，12岁便辍学辅助家庭务农，童年在家乡度过。17岁时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进入县立高等小学，后毕业于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。1935年1月下旬，他在怀玉山不幸被俘，入狱。同年8月6日，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，年仅36岁。

湖塘村离葛源盆地，骑马只需一个时辰。选择葛源盆地作为革命根据地，方志敏具有军事家的战略眼光。这里山深交错，地形复杂，人口众多，产粮产油，社会矛盾激烈。方志敏把葛源盆地当作实现“无产阶级”“苏式国家”的“试验田”去“耕种”，发展棉桑，大力种植粮

老兵离队前夕，西藏军区某特战旅组织老兵退伍晚会。一个个兵味浓郁的文艺节目，生动展现高原特种兵的热血与奉献。下图为歌伴舞节目《雪豹突击》。

红色葛源

■傅非

食，平分分田，各村成立农会，建立农业合作社，开办供销社，发行邮票和股票，通航兴学，兴建学校医院，扫盲识字，举办运动会，修公园，操兵练武。

在这片土地，流过血的革命先烈中，很多志士还没娶妻生子，便长眠于葛源盆地。黄球，被杀害时，年方27岁；邱金辉牺牲时，24岁；李穆死于枪口，时年29岁；钱壁流尽最后一滴血，19岁；项春福在正月初九牺牲，时年24岁；杨桂花牺牲时17岁……在革命时期，横峰县的成年男子，约有十分之一为革命奔走，直至捐躯，再也未回到家里。

这是一个梦想升起的地方，是一个信仰不会熄灭的地方，是一个热血可以点燃火把的地方。

我们行走在葛源的大地上，英烈的亡灵在注视我们。

我一遍遍地梳理每一次去葛源所遇见的人与事，回想它的山川地貌，体会它的风土人情。想起几次去石桥，在山沟一户吴姓老汉家喝茶，用蓝花碗泡手工夫茶，解解的。他粗大有力的手，我握住，糙糙的，树皮一样。他的几个小孩都成家了，住在县城。他还守着这栋石砌木屋。屋前种了枣树、松树，栽了吊兰、射干，屋后种了梨树、桃树、板栗、李树。蒲蒿是不用栽的，屋边水溪有。竹子是不用栽的，崖石缝里，拔节而起。映山红是不用栽的，放眼望去，都是。石墙是要砌好的，片石一块块砌起来，供苔藓和爬墙虎作篱笆。他守着老房子，像守着他的肉身。

“这是一个好时代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一直生活在好的时代。”他又说。

什么是好时代呢？每个人所描绘的，可能都不一样。葛源盆地把答案告诉了所有人。就像方志敏在《可爱的中国》所预言的：“朋友，我相信，到那时，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，欢歌将代替了悲叹，笑脸将代替了哭脸，富裕将代替了贫穷，康健将代替了疾病，智慧将代替了愚昧，友爱将代替了仇杀，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，明媚的花园，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！这时，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，而生育我们的母亲，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，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。”这一切已在我们的土地上实现。

盆地是一样的，是因为有梦想的人，始终会在盆地上升起长明灯，生生不息。



王述东摄



长征

第4695期